

加莱亚诺笔下有足球粗粝而率真的模样

杨龙跃



马拉多纳代表了加莱亚诺所定义的足球：贫困、奋斗、成功和放纵。(图/视觉中国)

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历史》中，加莱亚诺借由古埃及塔姆的嘴说：他人的记忆不能代替自己的回忆。而这，也是几番踌躇，难以落笔的原因。

因为在大多数意义上，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即便两个同样狂热的球迷，在同样一场比赛后经历的可能却是天堂和地狱。所谓“20世纪足球的编年史”这样的话，只适合写在腰封上，以阻断销路。每一代人的足球记忆，都不可复制，是不同圈层的年轮上，各自长出的枝叶。

是的，我承认，试图通过《足球往事》去代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没有朝圣的时刻，没有癫狂的瞬间，没有经历悲怆和流亡，没有在1997年大进金州的秋夜里，诅咒某个少不更事的愣头青后卫，也没有在2002年夏天骄傲地为新生的孩子取名为“志毅”或者“继海”。

这个段子同样来自加莱亚诺。初版的后记里，他写道：1994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在巴西的每一位新生的婴儿都取名叫罗马里奥。不必当真。这

个老小孩，不喜欢中性的表达，他喜欢一切传奇的意味，一切的不循常规——加林查的瘸腿，马拉多纳的不服管教，或者因为贝利被按下暂停键，难以落笔的原因。

这让我想起索萨记录下的加莱亚诺一件往事：少年时，女教师在课堂上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出去！”

比起打捞那些记忆之河中浮沉的名字，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一次令人目眩神迷的盘带，一脚石破天惊的射门，这种与生俱来的穿透力，才是散落在加莱亚诺的足球往事里，最令人兴奋的瞬间。

比如他形容加林查“只是一位幸运的失败者，而且幸运不可能一直持续，有句巴西俗语说得对：哪怕大便值钱，穷人也没资格上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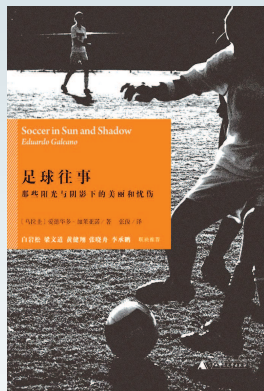
他数落世界体育的两个王者阿维兰热和萨马兰奇，“这两人管理着数额巨大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谁也不

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表现得略带羞涩”。

他记录下人性的荒诞：诗人豪尔赫·恩里克·阿杜姆长年漂泊后回到家乡基多观看一场球赛。开球前，人们为主裁判早上刚逝世的母亲默哀1分钟，并以深情的演讲赞扬他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履行职责的奉献精神。然后在开场不久的一次争议判罚后全场咆哮：“你这个xxx的孤儿！”

这些瞬间，是加莱亚诺抛出来的石子，用习惯性的弧线，穿破绿茵茵巨大的玻璃幕墙，用一片碎片照出你看不见的足球史。

同样一如既往的，是加莱亚诺的叛逆精神。正如他把乌拉圭足球队1924年和1928年两次奥运会夺冠定义为“重新发现美洲”。足球是拉丁美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政治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穷人的面包、旗帜和迷幻剂，代表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和无法压制的天性。因此，他痛斥职业足球对球员的规训，将之视为异化；他嘲讽功利足球的怯懦，让球员们斤斤计较忘却本能，如同“11只蝙蝠



《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张俊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幅倒挂在横梁上”；他反对一切把足球当成营销手段和牟利工具的政客和商人，并以“绑匪”和“害虫”为他们各自归档。

最为辛辣和执着的是，从1962年世界杯开始直至2006年世界杯，每一篇专门记录当届世界杯的文章中，加莱亚诺都会梳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并埋下一个梗——“迈阿密消息灵通的人士称，卡斯特罗又怎么怎么了……哦，反正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拉美知识分子的历史感，像一段只有知情者才能解开的密码，在时间里传递。

加莱亚诺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离开人间后第二年，一生逃脱过六百多次刺杀、熬走九任美国总统的卡斯特罗辞世，两人可以一起在天上看球聊球了。又没过多久，马拉多纳也来了……

而加莱亚诺同样不知道，他曾经写下的“没有比失去观众的看台更寂寥静谧的了”会在他身后成为现实。巨大的瘟疫让世界几近停摆，而职业足球似乎回到了最初的时刻，在空荡荡的球场上，发出为生存的低吼。

加莱亚诺也没有看到，在21世纪最为重视战术纪律的两大主帅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之间展开的一场对决中，一个叫拉梅拉的阿根廷人，用一脚匪夷所思的插花脚进球完成了对比赛的解放。然后，在一次不必要的犯规后被裁判用红牌解放。

他同样没有看到，在世界上第一个黑人球员进入乌拉圭国家队超过百年之后，种族主义的阴影，依然在球场中央游荡，单膝跪地成为共同的符号，而倔强站立变成另类的主张。加莱亚诺又会如何解读呢？

也许并不重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足球往事，血里的火，灵里的光。

理想主义者都是悲观主义者，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历史》最终篇里，加莱亚诺寄望于“消失的物”会不会“它们就藏在这地球上呢？”大概，总是相同的寄托，让这些热爱足球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记录下各自的美丽和忧伤。在加莱亚诺看来，至少足球要比世界败坏得慢一点。



《贪吃女王：维多利亚的饮食与王室秘辛》[英] 安妮·格雷著 祁怡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女王的餐桌：化悲痛为饭量

苏展

在世人看来，维多利亚女王是鲜亮的，担得起一切动人的辞藻。她风华绝代，王者之风浑然天成、不言自威。她在位64年间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盛名，长寿到令她的子民很难想象这世界没有她是否还能继续运转。时间给女王镀上了一层滤镜，以至于史料中那张身着黑色服饰、不苟言笑、身材矮小圆滚的老妪画像，反倒荒唐地失了真。

很难分清华丽的形容是在缅怀帝国的盛世还是刻画女王。在维多利亚的众多画像中，“黑女巫莎寡妇”的确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那张，当然这个标签是刻薄了些。或许任何带有正规传记要素的评述都会杂糅不同时代的思想和心理的投射，女王的面孔因此变得越发朦胧。在无数有关女王君臣、亲子关系、政见、风流遗迹等极富主观想象空间的王室秘辛中，英国食物史学家安妮·格雷的《贪吃女王》找到了相对不受个人控制的元素——饮食，“人的一生以吃为物定义，但维多利亚的人生似乎尤其如此”（第312页）。

她始终都是一位贪吃的女王。维多利亚和食物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7岁时，身陷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及其密友约翰·康罗伊将她栽培成傀儡的阴谋，维多利亚用食物宣示自己的主权。1861年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成为寡妇的女王在极度悲伤之中，化悲痛为饭量——“1861年后，再也没有顾虑的她体重迅速飙升，外交事务大臣在1868年评论道：‘（维多利亚女王）一切都好，就是变得胖极了’”（第174页）。

事实证明，嬉居兴许同样适合维多利亚。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两情相悦部分消解了两人政治联姻中的凛冽，但女王的统治生涯依然打上了鲜明的亲王印记。她深感婚姻备受桎梏，却无可避免地在感情和政务上对丈夫产生了依赖。以至于阿尔伯特离世，维多利亚曾一度避世。某种程度上，成为寡妇的女王打破了人们对她统治生涯的刻板印象。尤其进入老年后，维多利亚不再是“没有一个强大男人在身边支持，就什么事都不会处理”的女王；也不再囿于“失去阿尔伯特后，独自度过悲伤而漫长的下

午”的哀怨形象。她重新获得权力，并愿意且能够通过思考坚决地做出政治干预，而这正是她初为女王时最渴求的东西。影视作品《维多利亚女王：风华绝代》（The Young Victoria）中有一个桥段诠释了女王对权力的心态。维多利亚与初识不久的阿尔伯特对弈，女王试探道，“你不给我推荐个丈夫替我下棋吗？”阿尔伯特回答：“我会找人陪你一起下棋，而不是替你下。”

对于自我的找寻和重新定义需要极大的勇气。此时，维多利亚的孩子和侍女日渐不受控制，一国之君和英国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时脱离她的掌控，还有时刻关注她的媒体，劲头十足。于是食物变得格外重要——它们不会对她抱怨，不会论断她的功过，很少让她失望。

没有贵宾要接待时，女王的进食速度很快。跟女王一起用餐的人，总共半小时，“上菜上得快，像我这样吃饭慢条斯理的人……就连分量中等的一份菜肴都来不及吃完……”（第283页）一名政治人物，里布尔斯戴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详述过同女王用餐时的一起戏剧化事件，“维多利亚没选牛排，只选了豌豆汤，她三两下就吃完了，吃完就和哈廷顿大人（Lord Hartington）聊了起来，导致哈廷顿大人自己的吃饭进度落后……总之他们聊得正在兴头上，羊肉硬生生从他面前被收走了，那可是4岁大的羊做成的烤羊排！他话说到一半，连忙叫住那个穿红衣的掠夺者：‘给我拿回来！’我们这些在场的侍臣纷纷屏住呼吸——我们通常是斯文有礼的一群人，幸好女王一笑置之”（第284页）。

这是维多利亚婚后难得露出的笑容，至少在女王的餐桌上，她说了算。这或许是她成为女王后唯一有绝对控制权并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方。从1819年出生，1837年登上王位到1901年辞世，女王的一生都在王冠和世俗的钳制下，她无可逃避，也深感其重。不过好在终其一生，女王都有美食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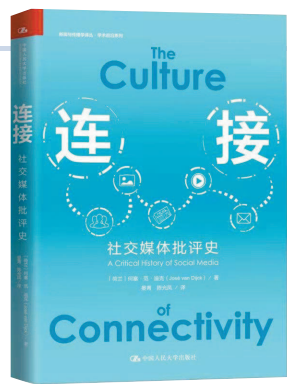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终其一生拥抱这个世界为她奉上的美食。

札 记

欧洲互联网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任大刚



《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荷兰] 何塞·范·迪克著 晏青、陈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数年前，欧洲互联网产业发展远不如美国和中国，就是个不争的事实。把2018年全球互联网上市企业的排行榜拉长到前30名，基本上也由中美两国企业把持，仍没有一家欧洲企业。时间又过去了三年，到现在，这份榜单也不可能出现欧洲企业。

前此数年，已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普遍认为，之所以欧洲互联网产业被中美大幅度甩在后面，原因大致有：

其一，欧洲国家人口分布状况复杂。总人口7.4亿的欧洲看似庞大，但除了俄罗斯人口过亿，排名第二的德国只有8000多万人口。48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过千万的只有14个。可以想象，一个德语版本的互联网应用，获得一两千万用户就算“国民级”应用，却也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但是与中美比起来，一两千万的用户量，商业价值不大，甚至不值一提。

其二，欧洲的语言环境太复杂。

表面看，全球超过12亿人在使用英语，仅次于汉语，但是在欧洲，它主要是英国和爱尔兰等国的官方语言，人口覆盖数千万而已。据统计，欧洲使用人口超过百万的语言有30种。一个互联网应用要在欧洲取得成功，你要设置多少语种版本？运营成本要额外付出多少？

其三，欧洲互联网初创公司的融资便利程度不及中美。欧洲企业和投资机构大多历史悠久，在管理和投资上更偏于保守，他们对于一个只有蓝图、理念、设想的创业计划，或者刚刚开张营业的互联网企业，不太会有投资冲动，他们多会让你先干上一二年，才会考虑投资计划，这种互联网创业环境远不及中美。

但欧洲也不是没有互联网企业。既然“获客难”，那么其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对象就专注于公司，做的是toB生意，为公司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不像大量的中美互联网企业，直接面向个体消费者，做的是toC生意。但显然，toB的业务增长极限，要远远小于toC。

虽然欧洲互联网产业不发达，更不处在互联网技术的前沿，但并不影响欧洲学者对互联网产业的关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传媒研究院的教授何塞·范·迪克的《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以下简称《连接》）就是一本关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著作。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这本写于2012年的著作，将近10年后才在中国出版，读起来如读“古籍”。毕竟，2012年前后，已经是PC时代的尾声，智能手机时代正在奔腾而来。而《连接》一书，虽然也将社交媒体时代的“霸权”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既然作者没有见过微信、抖音一统天下，也没有见过大型网购平台对零售业摧枯拉朽的攻势进而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那么作者会不会生

出一种“悔其少作”的情愫呢？

但不能说，因为作者在2012年没有预见智能手机集10余年前的PC、手提、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导航仪、短信、QQ、MSN、照相机、摄录机、游戏机、报纸、杂志、图书馆、收音机、电视机、碟片、软硬盘、影碟机、影院、计算机、钱包、自动取款机、小卖铺、大卖场等等于一身的智能终端，就武断地认为作者的见解没有价值。

事实上，在中美互联网产业高歌猛进的这些年里，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又比如个人信息保护，等等，在《连接》这本书里，都涉及到了。

作者在书中写道：“就像基因和草药在被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占有之前属于公共资源一样，各种类型的社交正在从公共空间转向企业空间；即使是在十年前，将社交行为编码为专有算法还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这些过程的品牌化和专利化了。今天，脸书、谷歌、亚马逊和推特都有自己的算法，这些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了我们喜欢、想要、知道或发现什么。关于软件和硬件所有权的争论，是关于什么构成了公共空间、非营利或企业空间的更为深刻的争论的核心，特别是对这些空间的区分在意识形态上陷入困境的时候。”

在高频率地使用社交媒体10多年后的今天，的确可以仔细回想，我们当年无忧无虑愉快地玩耍的那些社交平台，如何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企业的领地和钱袋子，我们或许可以自我说服：开发者要给各种工作人员发工资。

但是当社交平台成为巨无霸取得天文数字的市值和利润，而平台上呈现的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售卖的东西，都来自用户的免费

奉献甚至是花钱呈现，那么这个平台的所有权到底是谁的？这只是一个类似于信息超市的东西吗？

长久以来，绝大多数人不会去碰数据所有权这个高深莫测的问题，即便有极少数人去思考，也得不到什么共鸣，因为它的前置条件太多了。

但是当欧洲的学者差不多10年前不避繁难思考它的时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欧洲社交媒体类互联网企业的担忧。

作者注意到，2013年的用户和所有者与2006年或2002年的不同：商业模式和内容随着管理政策和界面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单一的平台调整都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规范和监管变革方案。这些平台相互占据什么样的私人、公共和企业空间，它们的交集如何影响我们对这些空间的相对概念？各种平台的架构和监管协议如何影响社会的法律规范和互惠？平台如何在货币化方案中彼此的变化，以及共享数据的机制是什么？

作者承认，上述问题涉及多种探究角度，每个角度都需要不同的学术专长。如果认真对待上述问题，我们至少需要从信息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学、法律和传播传播六个视角来洞察社交媒体的全景。

然而这些研究在其他地区是相对缺乏的。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稍一落后，迅速就被淘汰出局，根本容不下欧洲式的慢条斯理和陈情说理。法律不可逾越，这成了阻拦互联网产业野蛮（蓬勃）发展的一道障碍。

也因此，《连接》一书，也可以视为欧洲互联网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说明书。或许，在社交媒体发展到它的极致状态，人们开始从“社交”的癫狂中逐渐恢复理智的时候，这本“古籍”会被人们注意到它独到的价值。

翻 书